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 《文学评论》

## 六十年纪念文选

60

(第四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

# 《文学评论》

---

## 六十年纪念文选

---

60

(第四卷)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评论》六十年纪念文选：全四卷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9  
ISBN 978 - 7 - 5201 - 1305 - 2

I. ①文… II. ①中… III. ①中国文学 - 文学评论 - 纪念文集 - 1957—2017 IV. ①I2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2258 号

## 《文学评论》六十年纪念文选（全四卷）

---

编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出版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张倩郢

责任编辑 / 张倩郢

出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发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115.5 字数：1933 千字

版次 /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 - 7 - 5201 - 1305 - 2

定价 / 749.00 元（全四卷）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 - 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第一卷

### 文艺理论

- |                   |           |
|-------------------|-----------|
| 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问题      | 蔡 仪 / 3   |
| 艺术创作有特殊规律         | 王朝闻 / 22  |
| 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     |           |
| ——关于意象：表象与概念的综合   | 王元化 / 37  |
| 形象思维再续谈           | 李泽厚 / 47  |
| 论系统科学方法论在文艺研究中的运用 | 林兴宅 / 65  |
| 说 丑               |           |
| ——《美学新论》之一        | 蒋孔阳 / 78  |
| 文学与人类学本体论         | 陆贵山 / 89  |
| 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      |           |
| ——新理性精神           | 钱中文 / 107 |
| 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      | 党圣元 / 125 |
| 从西方文论的独白到中西文论对话   | 孙绍振 / 141 |
| 审美现代性的四个层面        | 周 宪 / 153 |
| 文艺美学诞生在中国         | 杜书瀛 / 168 |
| 文学与图像的对立与共生       | 高建平 / 192 |
| 新时期文学审美特征论及其意义    | 童庆炳 / 207 |
| 从文学理论到理论          |           |
| ——晚近文学理论变局的深层机理探究 | 姚文放 / 228 |

语图符号的实指和虚指

——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

赵宪章 / 243

强制阐释论

张江 / 264

论文学的思想倾向性

张炯 / 290

关于美学文艺学中“实践”的概念

王元骧 / 304

为什么麦克卢汉说中国是“听觉人”

——中国文化的听觉传统及其对叙事的影响

傅修延 / 321

## 比较文学

《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

范存忠 / 343

高尔基的文学史观点和方法

——《俄国文学史》中译本第二版后记

缪灵珠 / 376

略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创作中的思想表现

卞之琳 / 405

通感

钱锺书 / 434

亚理斯多德的《诗学》

罗念生 / 440

艺术是克服困难

——读《红楼梦》管窥

杨绛 / 452

欧洲文学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杨周翰 / 459

“无边的现实主义”还是无耻的“现实主义”？

——评加罗迪近著《无边的现实主义》

罗大冈 / 466

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

刘柏青 / 482

帝国的铿锵：从吉卜林到闻一多

江弱水 / 493

## 第二卷

### 古代文学

陆游及其创作

程千帆 / 509

“文心雕龙”初探

刘绶松 / 526

论关汉卿的杂剧

郑振铎 / 557

辛弃疾词论纲	夏承焘 / 582
再谈《胡笳十八拍》	刘大杰 / 596
论陆机《文赋》中之所谓“意”	郭绍虞 / 610
《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述	俞平伯 / 618
叶燮及其《原诗》	敏 泽 / 660
论意境	袁行霈 / 676
建安七子论	徐公持 / 691
论汉代和宋代的《诗经》研究及其在清代的继承和发展	胡念贻 / 707
试论北朝文学	曹道衡 / 732
《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	王利器 / 748
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	周勛初 / 774
论萧纲的文学思想	王运熙 杨 明 / 782
《坎曼尔诗笺》辨伪	杨 镰 / 796
永明诗歌平议	跃 进 / 816
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误点谈起	傅璇琮 / 832
论《诗经》比兴的联想方式及其与四言体式的关系	葛晓音 / 844
工具角色与回归自我	
——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当代价值认同问题	罗宗强 / 866
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	吴承学 / 881

## 第三卷

### 现代文学

论巴金的小说	王 瑶 / 903
《雷雨》人物谈	钱谷融 / 945
鲁迅与五四文学运动的现实主义问题	陈 涌 / 962
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	夏 衍 / 988
《野草》与中国现代散文诗	孙玉石 / 1003
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	唐 弢 / 1021
五四时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赵 园 / 1038



《呐喊》《彷徨》综论（上篇）	王富仁 / 1062
《呐喊》《彷徨》综论（下篇）	王富仁 / 1079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黄子平 陈平原 钱理群 / 1102
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我国文学的变革	刘 纳 / 1118
胡风与卢卡契	艾晓明 / 1142
预言与危机（上篇）	
——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	汪 晖 / 1165
预言与危机（下篇）	
——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	汪 晖 / 1178
现代作家的存在探询（上）	
——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解志熙 / 1199
现代作家的存在探询（下）	
——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解志熙 / 1222
佛学与中国现代作家	谭桂林 / 1235
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	
——海派小说都市主题研究	吴福辉 / 1256
认识老舍（上）	樊 骏 / 1276
认识老舍（下）	樊 骏 / 1296
论穆旦与中国新诗的现代特征	李 怡 / 1319
解读文学所	杨 义 / 1334
有声的中国	
——“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	陈平原 / 1361
“社会改造”与“五四”新文学	
——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视域	姜 涛 / 1400

## 第四卷

### 当代文学

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	何其芳 / 1421
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	严家炎 / 1450

- 关于历史和历史剧  
——从《卧薪尝胆》的许多不同剧本说起 茅 盾 / 1458
- 关于历史剧问题的争论 朱 寨 / 1491
- 特殊心态的呈示和文学经验的互补  
——从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看台湾文学 刘登翰 / 1503
- 美丽的遁逸  
——论中国后新诗潮 谢 冕 / 1517
- 当代西绪福斯神话  
——史铁生小说的心理透视 吴 俊 / 1531
- 废墟上的精魂  
——《白鹿原》论 雷 达 / 1546
- 九十年代：对当代文学史的挑战  
——兼论当代文学史的时间、空间与观念诸问题 於可训 / 1566
- “当代文学”的概念 洪子诚 / 1578
- 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 陈思和 / 1595
- 文学分期中的知识谱系学问题  
——从“当代文学”的“说法”谈起 李 杨 / 1610
- 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 谢有顺 / 1632
- 八十年代：话语场域与叙事的转换 南 帆 / 1646
- “1940”是如何通向“1980”的？  
——再论汪曾祺的意义 罗 岗 / 1663
- 在历史的“阴面”写作  
——试论《长恨歌》隐含的时代意识 陈晓明 / 1682
- 《心灵史》的历史地理图 程光炜 / 1704
- “传统潜结构”与红色叙事的文学性问题 张清华 / 1719
- 动荡年代里知识分子的“文化休克”  
——从新文学史重构的视角重读《废都》 丁 帆 / 1742
- 学科视域下的当代文学史料及其基本形构 吴秀明 / 1760





# 当代文学





# 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

何其芳

去年五月间，《处女地》的编者从东北到北京来，要我写一点诗歌方面的意见。我说，关于诗歌的文章我已写得不少了，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可写。他一定要我随便写点什么。我只好答应想想看。交稿期限已迫近，我仍是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可写。这时见到《人民文学》五月号上的公木的《诗歌下乡上山问题》，里面凭空给我加了一顶“反对或怀疑歌谣体的新诗”的帽子。这种无稽之谈应该辩明一下，其中有些真正分歧之处也可以提出来讨论。于是我就写了那篇《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以后我就忙别的事情去了。完全没有想到这样一篇小文章会引起一场大风波。大约是去年十月间，《处女地》的编者又到北京来了。他对我说，他看到了最近刊物上的一些文章，它们或明或暗地是反对我的意见的；他要我找那些文章来看看，答辩一下。但十一月我就外出参观去了。回来仍忙于别的事情，一直未能好好地看那些文章。《文学研究》的同志最近也催促我答辩。这样我才就我所能找到的找来浏览了一遍。我浏览的结果，我很惊讶，原来我已经犯了这样多的原则上的“错误”了：

一、怀疑民歌，轻视民歌，否定民歌，歧视民歌，或者说怀疑新民歌，轻视新民歌，否定新民歌。给我加上这些“帽子”的是张先箴同志的《谈新诗和民歌》（《处女地》一九五八年十月号），宋垒同志的《与何其芳、卞之琳同志商榷》（《诗刊》一九五八年十月号），沙鸥同志的《新诗的道路问题》（《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等。这第一个“帽子”已经比公木要强迫给我戴上的帽子大得多了。已经不仅是反对或怀疑歌谣体，而是怀疑、轻视、否定、歧视整个民歌，整个新民歌了。



二、主观唯心论。这也是张先箴同志给我加上的。

三、四、资产阶级的艺术趣味和个人主义倾向。这是萧殷同志在《民歌应当是新诗发展的基础》（《诗刊》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号）中给我加的。这个批评家一上来就指斥我“妄图创立什么‘新格律诗’，或者‘现代格律诗’”，最后又如临大敌似的大声疾呼：“对于那些妨害新诗歌发展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趣味与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倾向，千万不要放松警惕，应当开展斗争。”他给我加的是两大“帽子”。为了叙述方便，姑且写在一起吧。

五、形式主义的观点。见陈骢同志的《关于向新民歌学习的几点意见》（《诗刊》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号）。

六、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诗人和群众的结合、知识分子诗人的彻底改造或工人阶级化有所抵触。见曹子西同志的《为诗歌的发展开拓道路》（《文艺报》一九五八年二十期）。他的文章的副标题是“介绍诗歌问题的讨论”，表面上是报导，实际上却是把我和卞之琳同志的意见同雁翼同志的意见放在一起，并且断章取义地引用我的话，从而认为大有问题的。

七、影响人们不去深入群众斗争的生活。见宋垒同志的《分歧在这里》（《诗刊》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号）。

八、九、是思想问题，是要不要走群众路线的问题，是要不要真正的民族风格问题，是为什么人唱什么歌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唱什么歌”的问题。见李根宝同志的《不是形式限制问题》（《萌芽》一九五八年二十四期）。这位作者给我加的“帽子”是一大堆，到底应该算几个呢？我想，至少应该算两个吧。一是不要群众路线，二是不要民族风格。总起来是思想有问题，不愿为工农兵服务，违反时代要求。

十、十一、对民族诗歌传统的学习抱着轻视态度，不分青红皂白地强调“五四”新诗的传统。是田间同志的《民歌为新诗开辟了道路》（《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三日）。田间同志是个诗人。他给我加这些“帽子”完全不说明有何根据。我什么时候轻视过对民族诗歌传统的学习？什么时候又不分青红皂白地强调过“五四”新诗的传统？这真使人有如坠梦中的感觉了。

十二、十三、是用老眼光看待新事物；是贬低了从古典诗歌和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包括从旧形式推陈出新发展新形式、新格律的创造性的努力。这样两个新的“帽子”是张光年同志新近才在《在新事物面前》

(《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中给我加上的。张光年同志是截至现在对这个争论发言最晚的一位批评家。他似乎想表现得公正一些，因此开头表示可以网开一面，说他并不认为我和卞之琳同志主观上有意轻视新民歌，但实际上他却是看到上面有些人拳法太疏，用尽全身之力向空中扑去，结果不过自己跌了一跤，于是想用另一派的拳法来援助他们一下而已。不管他怎样想表现得公正一些，他的立场还是明显的。他口口声声说“何其芳同志的看法和我们的看法很不相同”，“我们和何其芳同志的分歧就在这里”，“我们和何其芳同志之间”等等。这“我们”是谁？难道这不是张光年同志自居为前面那些给我加上种种“帽子”的人们的代表吗？他整个文章不过是证明我受到种种不公正的批评都是有罪有应得：如果你不是有这种错误，就是有那种错误，总之挨棍子（他美其名曰“有时还不免受到人们的误解”）“这又能怪谁呢”！

……够了。我的“错误”已经够多了。一个人如果神经脆弱一些，是会被这些批评弄得糊涂起来的。按照这些作者的逻辑，我敢说世界上的任何文章任何话语都是可以找出它的毛病来，并且给它加上种种罪名的。人要是碰到这样的争论的对手，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还有什么可以答辩的呢？我国古代有一个故事：曾参本来没有杀人；有人告诉他的母亲，说他杀了人；他的母亲不相信，照样坐在织布机上织布；但等到连着有三个人异口同声地告诉她曾参杀了人，她却也就相信了，害怕了，扔掉梭子，翻过墙就逃跑了。“何其芳轻视民歌”，不过是属于“曾参杀人”这一类的故事罢了。

## 二

我重又翻看了我那篇引起风波的文章。我不能说它毫无缺点。我在后面是要讲到它的缺点的。但是，它的缺点实在和上面列举的那些“批评”太不相称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首先应该说，上面那些“批评”很多都是用歪曲我的论点的办法和武断的办法制造出来的。

比如，我在那篇小文章里曾写过这样几句话：

我们要开一代诗风，这不但是一个响亮的口号，而且是一个要富有创造性方能做到的雄举。要完成这个雄举，我们当然首先要继承我

国古典诗歌和民间诗歌的可贵的传统。继承传统有一个形式上如何继承的问题。这个问题大家意见不尽相同，还可讨论。但继承传统并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比如现在受到全国重视的大跃进歌谣和过去的革命歌谣，它们最吸引人的还并不是它们的形式，而是它们的内容表现出来了神话中的巨人式惊天动地的征服自然的精神，反抗的精神。此外，在艺术表现方面也还有问题可以深入研究。（黑点是这次引用加上的——何其芳）

这段话的后面的意思，到了张先箴同志的手里，就被改成这样了：

何其芳同志的主观唯心论还表现在对新民歌的形式与内容问题的看法上。何其芳同志认为今天的“大跃进歌谣和过去的革命歌谣”之所以好，能吸引人的，“并不是它的形式，而是它的内容表现出来了神话中的巨人式的惊天动地的征服自然的精神，反抗的精神。”（黑点是我加的，下同——何其芳）

“最吸引人”被改为“所以好，能吸引人”了。为什么前后都引原文，唯独中间要改呢？这不明明是要歪曲别人的论点吗？经过了这样的篡改，于是就制造出来了我把新民歌的内容和形式“分裂开来”、“肯定内容”、“否定它的形式”的结论。这位作者难道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来的批评家吗？为什么他和我们地球上的人这样没有共同语言呢？“最……”难道不是语法上的最高级的形容词或形容短语吗？除了“最吸引人”而外，不是还有“次吸引人”、“再次吸引人”、“三次吸引人”……吗？为什么不是“最吸引人”就成了不“能吸引人”，就成了被“否定”呢？这位作者还说：“马列主义辩证法认为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矛盾统一的，不能把它分裂开来肯定谁，否定谁。”按照马列主义的辩证法，当然不能够把内容和形式割裂开来看，但在内容和形式很统一的作品之外，不是还存在着两者不完全统一的作品，即内容比较胜于形式或者形式比较胜于内容的作品吗？为什么讲了新民歌的内容“最吸引人”，就成了主观唯心论呢？这位作者还说：“只有内容，而没有形式，其内容就会是枯死的；反过来，只有形式而没有内容，其形式就是无有的、不存在的。”世界上哪里有什么“只有内容而没有形式”和“只有形式而没有内容”的东西呢？这种奇特而神秘的高论恐怕也只有另一个星球上的人才能理解和欣赏了。

也许有人说：人家不过改了你一句话，你何必大做文章呢？要知道，许多“错误”都是从这里来的呢。后来有些批评家也是在这样的歪曲我的论点的基础上建立他们的批评的。宋垒同志在他的《与何其芳、卞之琳同志商榷》中，一开头就断定我和卞之琳“轻视新民歌”。他的第一个证据也就是这样造成的：他说我和卞之琳同志认为“新民歌主要以内容取胜，引人之处不在其形式”。他也是引了我那句话，作了这样的歪曲，然后就断定“这种看法，错误地把形式和内容机械地加以割裂”。他比张先箴同志增加了一点的，是他还批评我“对新民歌的内容也是肯定不足”，因为我只讲了那样的内容，而新民歌还有别的内容，我却并没有讲到。这也是他对“最吸引人”的理解和我们地球上的人大不相同的缘故，他以为“最吸引人”就是“唯一吸引人”。后来卞之琳同志在《分歧在哪里》中作了说明，说他和我都并不轻视新民歌，也并没有否定新民歌的形式。这位批评家却既不相信别人的声明，也不相信事实，仍然强为自己的歪曲和武断辩护。他在《分歧在这里》中这样说：

卞之琳同志既然承认：“宋垒同志说何其芳同志和我认为‘新民歌主要以内容取胜’，大致不差。”人们就不禁要问：新民歌的“取胜”的“内容”，所以会为人们所欢迎，不正是通过新民歌的形式来表现的吗？认为“新民歌主要以内容胜”，言外之意，不就是新民歌的形式不足取吗？……如果新民歌的形式不足取，内容也就无处依附，又怎么谈得上“以内容取胜”呢？这不是轻视以至否定新民歌的形式，又是什么呢？

这位批评家的词典和逻辑也是这样的：不是“主要”就等于“否定”；“主要以内容胜”就等于“形式不足取”，就等于“否定新民歌的形式”，就等于“轻视新民歌”。他最后还这样吓唬人：

“分歧在哪里”呢？我看分歧是不小的，不止是轻视新民歌的问题，这是诗歌发展问题上两条恰恰相反的道路。

你不承认“轻视新民歌”的“错误”吗？我把你的“错误”再加重一些：还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呢。说了一句“最吸引人的还并不是它们的形式”，或者承认了一句“新民歌主要以内容取胜”，问题就有这样严重呢！

还有沙鸥同志，他在《新诗的道路问题》中把我和卞之琳同志和李亚群同志各打五十板，好像我和卞之琳同志是诗歌道路问题上的右倾的代表，李亚群同志是诗歌道路问题上的带引号的“左”倾的代表。他把我们三人的论点叙述和概括为五种说法，三种指我和卞之琳，两种指李亚群。但没有一种不是歪曲我们三人的原意的。只要把他的叙述和概括同我们三人的原话一对照就很清楚。对我和卞之琳同志的论点的第一个叙述和概括是：

一种说法是：新民歌不过是以内容取胜，形式是旧东西，不足道。

这真是青出于蓝而更胜于蓝了。宋垒同志把我的意思概括为“主要以内容取胜”，沙鸥同志就更进一步，干脆改为“不过是以内容取胜”了。

这是第一个被歪曲的论点。我的许多“错误”就是建筑在这第一个“空中楼阁”之上的。

再比如，我在那篇小文章里曾写过这样几句话：

我们说的民歌体的限制，首先是指它的句法和现代口语有矛盾。它基本上是采用了文言的五七言诗的句法，常常要以一个字收尾，或者在用两个字的词收尾的时候必须在上加一个字，这样就和两个字的词最多的现代口语有些矛盾，写起来容易感到别扭，不自然，对于表现今天的复杂的社会生活不能不有所束缚。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到了张先箴同志的手里，就被改为“民歌的‘基本’句法难以表现今天复杂的社会生活”了。他不但把“不能不有所束缚”改为“难以表现”，而且反过来说我自相矛盾，说我“前面说民歌的‘基本’句法难以表现今天复杂的社会生活，而后面却又说民歌能表现，而且是‘表现出来神话中的巨人式的……’”。他好像对“对于表现今天的复杂的社会生活不能不有所束缚”这样一句普通话都不能理解似的。“不能不有所束缚”者，虽说也能表现、却多少要受些限制之谓也。不知道他读过毛主席的《关于诗的一封信》没有？毛主席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不知道他是不是认为毛主席的这几句话也自相矛盾？为什么



毛主席和过去的许多杰出的诗人都用旧诗的体裁表现了复杂的生活和思想，仍然可以说也应该说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呢？难道毛主席说了这样的话就是怀疑、轻视、否定和歧视古典诗歌吗？张先箴同志口口声声讲“马列主义辩证法”，但碰到民歌体能够表现今天的生活却又有所限制这样的矛盾统一的现象，就把辩证法忘得一干二净了。

宋垒同志和丁力同志比张先箴同志更进一步。他们更干脆把“不能不有所束缚”改为“不能表现现代复杂、丰富的生活”和“不能表现现代生活和复杂的思想内容”（丁力同志的篡改见他的《诗话》，《文艺报》一九五八年二十期）。这真有些像谣言的发生一样，越来越远于事实了。

这是第二个被歪曲的论点。我的许多“错误”也是建筑在这第二个“空中楼阁”之上的。

再比如，我在那篇小文章里还曾写过这样几句话：

今年四月号《诗刊》上发表的工人同志们关于诗的形式意见，就不一样。有的说喜欢快板诗，喜欢民歌民谣一类的作品；有的说喜欢自由诗而不太欢迎格律体；有的说“我对于诗没有什么偏见，只要是好诗，我都喜欢，不拘形式、风格”。至于工人同志们自己写的诗，有的刊物发表的是快板诗为多，有的刊物却又主要是半自由体和自由体的新诗。近几年来，刊物上流行这样一种诗体：每节四行；但大致押韵，但不严格；每行的节奏不整齐，也不是有规律的变化，就和自由诗一样。这种体裁我叫它作半自由体。这种体裁是否好还可以讨论，但在不少写诗的工人同志中间好像也流行起来了。今年四月号《诗刊》上发表的工人作品，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诗。此外，还有完全是自由体的诗。这些事实难道还不能证明在工人中间，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接受了歌谣体以外的新诗吗？

这段话是针对什么问题说的呢？是因为公木认为我们今天的新诗“还没有走出知识分子底圈子”，因而强调“每个诗人都必须学会歌谣体，必须大力写作歌谣体的新诗”，好像别的诗歌的形式一切人民群众都不能接受似的。我也认为农民容易接受歌谣体，因此我说，“说到下乡上山，即是说诗歌要到今天的农村和农民中去，我也是主张利用民歌和其他民间韵文形式的。在这个问题上本来也没有什么争论”。然而我不赞成笼统地说一切人民群众都不能接受歌谣体以外的其他的诗歌，也不赞成笼统地强调一切